

让穷人也能看得起病



□胡星斗
北京理工大学人文学院教授

一、医疗困境

胡适曾经说,“五鬼”闹中华。所谓“五鬼”,就是贫穷、疾病、愚昧、贪污和社会动乱。其中,疾病之鬼至今仍在侵扰中华。

《深圳商报》2005年7月30日报道,2003年与1993年相比,十年之内患病的人数比例从140.1%上升到143.0%,而门诊量却下降了1.09亿人次。《中关村》杂志2005年3月报道,2003年,全国未就诊人次为23.5亿,相当于总患病人次的47%。这些患者既不上医院,也不看医生。

卫生部的一个副部长在国务院新闻办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,目前中国农村有40%—60%的人看不起病。在中西部地区,由于看不起病,住不起院,死在家中的人占60%—80%。

根据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结果,我国城市没有任何医疗保险的人口占总人口的44.8%,农村占79.1%。也就是说全国有约3/4的人口在患病时得不到政府的任何帮助。

另据卫生部调查,农村地区儿童疫苗的接种率在下降,计划免疫建卡率从1993年的87%下降到2003年的56%,三级预防保健网破裂,慢性病上升,农村血吸虫病、肝炎等疾病的预防无人问津。在农村,前两位的慢性病也就是循环系统疾病和消化系统疾病的发病率从1993年的1.6%和2%上升到2003年的3.1%和2.5%,农村因病致贫或返贫人口占贫困人口总数30%以上,有的地方占70%。老百姓有民谣“小病撑,大病扛,重病等着见阎王”;“救护车一响,一头猪白养”。可见对普通的老百姓来说,看病是何等的艰难!

1997年中央提出力争在2000年建立起合作医疗体系。但是,现在早过了2000年,农村合作医疗,尽管它的保障水平非常低,也只覆盖了农村人口的10%。据北大医学部2005年对河北农村的调查,农民对新型合作医疗中得到的报销款仅占大病花费的8%。这样,很多农民对合作医疗失去了兴趣。到2003年,

全国还有23%的行政村没有村卫生室,即使有村卫生室,绝大多数村医也只是卖药的个体医生,没有政府投入,没有预防保健。一些乡镇卫生院也纷纷倒闭或者卖给了私人,农民更加看不起病。

据《当代中国研究》2003年第4期报道,从1991年到2000年,中央拨给农村合作医疗的经费仅为象征性的每年500万,地方政府再配套5000万。全国农民分摊下来,平均每人每年只有1分钱。

中国人口占世界的22%,但政府的公共卫生投入仅占世界的2%。中国卫生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仅为2.7%,而美国为13.7%,印度为5.2%。

目前医院的运营成本中,政府投入仅占6%,94%靠医院自筹。据2006年11月2日卫生部公布的资料,全国用于国有医院建设的资金为185亿人民币,其中财政投入23%,其他的都由医院自筹。目前全国医院的长期负债额达到351亿元。

一方面是政府的投入很少,另一方面是不公平。中国卫生的公平性在世界191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倒数第四。中国80%的医疗资源集中在少数大城市,极其有限的财政投入大部分被特权阶层所占用。据《社会科学报》2005年11月9日报道,在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,80%被850万党政干部所占用;40万干部长期疗养,占据干部病房、贵宾病房,一年的疗养花费约500亿元。可以说,中国的医疗卫生实行的是等级制度,一方面许多干部住院是为了疗养而不是看病,另一方面,中国有近一半的人看不起病,中西部地区60%到80%的人无钱看病,死在家中。

在中国的卫生事业经费中,中央仅占6.5%,地方政府占93.5%,这种以省级财政为主的医疗体制也极大地影响了卫生公平性。由于地区差距,河南的人均卫生费用不到上海的十分之一。

中国医生的公开收入是比较低的,他们救死扶伤,非常辛苦,但由于各级政府不愿投入,逼迫着医院搞所谓的“产业化”,医生也就变成所谓的“宰”病人的“白衣屠夫”,他们以各种方式收取病人高额的费用。甚至,医院里药的利润空间在100%

—1000%,也就是说,药的成本价与销售价之间可能有2到10倍的差额。据中央电视台《今日说法》2004年8月19日报道,有一种药品叫氯胺酮,出厂价20元钱,但国家定价却在134元。据《法制晚报》报道,一种叫硫酸软骨素的注射液,药店的零售价是0.46元,但通过政府招标采购进入医院后的售价为28.92元,价格飞涨了63倍!

另外,药厂也虚报药品成本。根据2006年国家审计署的调查,34种药品成本申报不实,平均虚报一倍多。某企业生产的一种注射用的针剂,实际成本是每瓶32.07元,但它申报成本为266.50元,虚报了7倍多。

由于有关方面对于现成的药品有药价规定,新药才可以高价格,于是制药厂伙同药监局以旧药换新装的方式大量推出“新药”,国家药监局每年竟审批上万种新药(药监局自己承认为一千多种),而世界上药品研发的主要国家美国2005年也才审批新药81种。

中国有关部门故意将药价定得非常高,而且大量审批新药,目的就是让医院“以药养医”,以便推卸政府的财政责任。据世界银行的报告,中国的药品费用占全部卫生支出的52%,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为15%到40%。由于卖药、开大处方,导致中国卫生费用的12%到37%被浪费掉了。

中国医院的医疗器械也是价格高昂。比如,一个3625元的心脏支架,在病人买单的时候却是16000元,比出厂价涨了四五倍。原因就是现有的医疗器械销售体制,是一种层层代理制,有全国代理商、大区代理商、省级代理商、市代理商等等,然后器械才能到达医院,医院有关人员又要提取回扣。这样,医疗器械到了患者手中,价格就涨了好几倍。由于医疗器械价格高企,又促使医院对病人多次检查、重复检查,以便多收费。中国为什么不允许医疗器械企业与医院之间的直接交易,而要实行多层次代理制度呢?无非就是要养活几百万的中间商、代理商。但为了满足这些既得利益者的胃口,上亿人民群众付出了看不起病的惨重代价。

由于药监部门与药厂、中间商、医院合谋牟利,患者的利益必然无

法保障。如哈尔滨的“中国最昂贵死亡”,一位老人住院67天,花了550万元。其中最多的一天输血94次,注射盐水106瓶,住院一个多月仅血糖就化验了588次,肾功能检查299次,血气分析397次。其家属向卫生监管部门投诉数百次都石沉大海,最后是中纪委和监察部下令调查,报纸才披露出来。重复检查,开大处方,虚报医药费,以及医疗监管机构不公正、不独立,使得中国的普通老百姓看病雪上加霜。

二、实行免费基本医疗制度

中国应当实行、也有条件实行免费基本医疗的制度,也就是全体公民有权利享受较低层次的免费的医疗保健预防服务。进而中国应当在不远的将来实现基本医疗、基本养老、义务教育的“三免费”制度。

印度的人均收入比中国低得多,但是印度基本实现了全民免费医疗、教育,印度的老人包括农村老人都享有政府的补贴。

印度能做到的,作为社会主义的中国一定能够做到。

新一届政府在推广农村最低生活保障、合作医疗、教育“两免一补”等方面取得了非凡的成就,一定能够在全民免费基本医疗以及“三免费”方面作出自己的贡献。

据专家估算,较低层次的全民免费基本医疗一年大约需要资金1500亿元。目前,中国一年的财政收入近4万亿元,2006年比上一年新增财政收入7000亿元。中国每年的“三公”(公款吃喝、公车消费、公款旅游出国)支出近1万亿元,只要节省一点,免费基本医疗的经费就有了。

2006年10月,胡锦涛在政治局会议上强调医疗改革一要坚持公益性,二要强化政府的责任,三要建设一个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卫生保健制度。此言可谓一语中的,对于指导今年卫生改革方案的出台、解决13亿国民的看病难、看病贵问题至关重要。

坚持公益性,强化政府的责任,就是国有医院应当平等、免费或者廉价、优质地提供医疗服务,决不能惟利是图,更不能抛弃病人;政府部门要做好对医院的监管、确保对国有医院的全额投入;

实行医、药分离,杜绝以药养医、开大处方、进高价新药、重复检查、医疗特权等问题。

建设一个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卫生保健制度,就是要打破城乡、地区、所有制的界限,建立以社区医院和乡镇卫生院为诊疗基本场所,覆盖全民、城乡一体化的医疗预防卫生体制。

第一要加大对国有医院的投入。城市要大力发展国有的社区医院、全科门诊,做到小病不出社区。每个县城至少有两个国有医院,每个乡镇至少有一个国有卫生院,建立全额投入机制,完善其预防保健的职能,改变农村卫生重治轻防的现状。

第二要扶持私立医院的发展,在急救业务、医保定点等方面对之一视同仁。过去医疗改革的失败,不是因为产业化,而是因为没有民营化的产业化,没有鼓励民营医院的平等发展。一方面,政府想甩掉医疗的财政包袱,另一方面又不给民营医院平等的发展空间,因此就放任垄断的国有医院靠高价卖药或过度检查来取得收入。以后,国有医院只保障基本医疗,保障普通老百姓都看得起病,有钱人如果想获得更好的医疗服务,可以付高价到私立医院去看病。即便是私立医院,普通人也能看得起病,因为通过激烈的竞争,它的药价也会降下来。而且在私立医院,医生、护士的服务会更加到位。

第三要保证医务人员有比较合理的报酬。提高医生的公开收入,对于收受回扣、红包的行为予以重处。根据《福布斯》报道:美国收入最高的25种职业中,医生包揽了前八名,其中外科医生收入第一。在美国,医生没有收受回扣、红包的事情。

第四要医、药分离,允许药店设立在医院附近。患者可以自主选择是在医院拿药还是到附近的药店买药。同时取缔医疗器械多层次代理体制,建立企业与医院之间的直销制度。

第五要进一步完善农村合作医疗、城市居民及农民工大病统筹、医疗保险等制度。加大政府对农村合作医疗的投入力度,提高农村合作医疗报销的比例,做好农村合作医疗与农民工大病统筹的衔接。

第六要取缔高干病房、疗养院,降低药价、手术费,在不同地区、不同人群之间公平分配医疗资源。

第七要改革慈善体制,鼓励慈善事业的发展,允许公民设立慈善基金会和慈善医院。美国有公益组织120万个,慈善机构73万家,慈善基金会56600多家。中国原来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官办慈善机构,2005年有了全国第一家私人慈善基金会和第一家慈善医院,以后应当继续大力发展至数十万家、数百万家,才能满足中国弱势群体的现实需要。

第八要加强政府对医疗卫生事业的监管,建立独立的医疗事故鉴定机构和医疗纠纷仲裁机制,强化媒体和民众对卫生部、药监局的监督和问责。凡是造成民众医疗困境和重大医疗事故,有关政府部门负责人必须辞职。

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,全民免费基本医疗制度,以及基本医疗、基本养老、义务教育的“三免费”制度,会在中国实现。

■财富漫谈

普洱茶的启示

□张晓晖

看了某刊物上的一篇文章,大意是对普洱茶的炒作提出异议,并向普洱茶究竟“是茶还是古董”。说起炒作确实挺凶,据说有些品种的价格上涨了数十倍甚至上百倍,还有卖掉宝马车去收购普洱茶的。当然,这是被说成“越陈越香”的陈年老茶,新茶不会这样,能往里兑开水的茶叶炒不起来。记者面对陈年老茶的炒作又问了一个匪夷所思的问题,“普洱茶真的越陈越香吗?”

很好笑,这些问题本来不是问题,炒起来的普洱茶当然是古董,不是茶,确切地说是几十年前的普洱茶,经过岁月的“自然发酵”(人工发酵不算数),才成了古董。既然让普洱茶升值的是岁月,那不是古董是什么?另一方面,炒到几十万、上百万的普洱茶不是茶,因为它不是用来喝的,除非那位让钱烧得难受。

两百年的葡萄酒是古董,不是酒;百年的茅台是古董,不是酒;几千年的司母戊大方鼎和四羊尊是古董,不是盛东西的器皿,很正常。

既然是古董,那么“越陈越香”很重要吗?因为这已经不是消费品,而是投资品了。普洱茶之所以成为古董是因为岁月,更是因为稀缺,物以稀为贵么,如果当初窖藏里有十亿块,全国人均一人一块,得,那就值不了钱了。

对普洱茶的炒作看法多多,但归根结底还是应该站在几个标准上去看,现在的流动性大大过剩,什么都炒,从古董到股票,从房地产到矿产,为什么?钱多!

当然,有些东西是不能纵容炒作的,比如房地产,那是要影响社会稳定的;比如矿产,那是要影响国计民生的。

有些东西是可以炒的,但不能太过头,比如股票,股票市场的收缩与膨胀被经济发展影响着,反过来也影响着经济发展。

有些东西是可以炒的,谁来玩儿谁去玩儿吧,一方面这些东西不会过分地吸收资金,对经济影响不大;另一方面,老百姓玩儿不起这个,资金上的门槛很高,没个几百万玩儿得了普洱茶?那位卖了宝马,还是因为他有宝马,要是他有辆奥迪,您看他卖不卖?玩儿古董要有钱,更要有眼光,要是买了废品蚀了本,那只能怪自己,没那金刚钻别揽瓷器活儿呀。



这是一款用普洱茶压制而成的“古”钱币造型的茶饼

普洱茶的炒作还是有正面意义的,让世界知道中国有个云南,知道云南有个普洱茶,普洱茶能“消食、化痰、解暑、醒酒、生津、降血脂”,通过炒作间接带动普洱茶的消费和出口,带动云南的旅游,让到这儿来的人都带包普洱茶回去,挺好!

投资品和消费品是不同的,消费品的价格与其使用价值有关联但有偏差,一万元的皮尔卡丹与地摊上一百元的西服比,前者未必比后者好100倍;奥迪的性能未必比奥拓好10倍,但消费品给人带来的不仅仅是使用价值,还有心理满足,越是奢侈品,给人带来的心理满足越大,价格与其使用价值的偏差也越大。

投资品则完全没有使用价值,您决不会拿赛季子玉盘去盛菜,不会用钧瓷瓶去盛凉开水。所以,拿消费品的使用价值去衡量投资品的价格本身就是有问题的。毕竟,炒作的普洱茶与我们沏水用的普洱茶是完全不一样的,此普洱茶非彼普洱茶。

既然是投资品,那么炒作本身肯定是吸引资金的,特别是在全球化的今天,谁来吸引资金?吸引谁的资金?大有讲究。

吸引国人甚至外国人收藏普洱茶难道不是好事儿?中国富人在欧洲一掷千金,到机场商店花几千上万欧元买外国葡萄酒,是不是有点冤大头?与其那样,还不如去炒普洱茶,给咱中国的好东西做做宣传,打打广告。

当然,炒普洱茶有风险,暴炒上去的价格呆不住,迟早还得下来;现在普洱茶热还好好说,将来凉下来怎么办?话说回来,普洱的炒家绝大多数是富人,风险承受力还是有的,至于说在这个市场里明白人赚糊涂人、内行赚外行,不稀奇,所有的市场概莫能外。

总的来说,要适应泡沫化生活,钞票多了,实物资产上凝聚的钞票当然就多,很正常,钱来时如大海决堤、山崩海啸,钱去时如雪泥鸿爪,白茫茫大地真干净。

制订标准固然很重要,什么色泽、手感才是二十年以上的?但标准也抑制不了暴炒,更不能改变暴炒的不透明性。就像古董,专家不少,相关机构也不缺乏,但赝品永远杜绝不了。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道理,没有赝品的市场根本就不是市场,完全透明的市场也不是市场。

即使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,重商主义也并非就过时了。货币往哪里流很重要,货币流动既是繁荣的结果,也是繁荣的原因,如何吸引货币流入,很有学问。从这个角度上说,如何对待普洱茶的炒作,不是小事。

高考尽带“黄金甲”

□马婧婧

“高考经济”真是步步为营:从专为考生静心备考的钟点房、安神补脑的营养品、金榜题名后的谢师宴等“老三样”,到考生心理“按摩”、考后放松游、互联网高考咨询等“新三样”,“高考经济”不断花样翻新。但实际情况是,商家生意火爆,家长叫苦连天。“谢师宴”一桌动辄数千元,对经济宽裕的家庭来说不成问题,但对一般家庭而言或许就是一家人几个月的生活费了!

“一切为了孩子,为了孩子一切。”然而一旦跟金钱挂钩,难免会变了味。高考经济看上去很美,但到底美了谁、苦了谁、害了谁?为了

孩子出人头地,家长可以一掷千金、不惜一切代价。高考经济热最大的受益者是商家。

无论“老三样”还是“新三样”,都是一些商家围绕高考经济做的文章,很多本来不沾边的广告和商品都被贴上“高考经济”的标签。其实大多数商家看重的是经济效益,而不是孩子的身心健康。正常的营养和心理辅导无可厚非,但是考前吸氧、考后摆宴,还有所谓的“高考兴奋剂”,则无疑是劳民伤财。

更值得注意的是,“高考经济”暗藏腐败。有些家长大办“谢师宴”、“状元宴”,“公款消费”往往混迹其中。有些身居要职者孩子考上大学,“谢师宴”正中下怀:出席

“谢师宴”的“亲朋好友”总不能空着手来吧?老师们吃这样的“谢师宴”能否心安理得?

面对“高考经济”热,我们有必要作冷思考:社会应该倡导文明风尚,不应刻意炒作“高考经济”,防止相互攀比的畸形消费。家长应该摆正心态,让孩子考后放松是应该的,但不要忘了自己的承受能力,千万不要相互攀比,更不要借此“腐败”。表达对老师的感激之情,心情可以理解,但是要注意方式、方法,比如栽棵“谢师树”不是更有意义吗?政府要承担起应尽的责任,让更多家庭能承受得起教育消费,让更多的学生接受高层次的教育;同时规范商家的经营行为,以免毒害了社会风气。

